

高等教育发展的 “中国模式”

Gaodeng Jiaoyu Fazhan De

Zhongguo Moshi

刘 晖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广州大学教育学科攀登丛书

“广州市重点扶持学科和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资助

高等教育发展的 “中国模式”

Gaodeng Jiaoyu Fazhan De

Zhongguo Moshi

刘 晖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刘晖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405-4

I. ①高… II. ①刘…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38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德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n.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们总能摸到石头吗？

（代序）

白驹过隙，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走过了 35 个年头。描述中国社会的变迁，使用“翻天覆地”一词当不为过。

思想的空前解放、GDP 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的昂首阔步、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互联网的无孔不入、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提前实现、莘莘学子负笈海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更为深层而重要的变化发生于人们的内心世界，且常常处于盘根错节的矛盾与冲突之中：既有人性复苏的精神解放，也有进退失据的道德困惑；既有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也有弥散四处的缺乏安全感；既有精确社会发展指标带来的方向感，也有核心价值观迟迟未果的紧张感；既有催人进取的未来梦想，也有充满戾气的社会疾病。

大体上，伴随社会快速变迁的是社会矛盾的加剧——传统与现代、美好与丑陋、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英国社会的描绘：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狄更斯生动地解读了转型社会的文学形态。

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始终伴随着精神的洗礼，甚至是脱胎换骨的文化僭越。在历史厚重的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发展的路子前无古人，没有可资参照的经验，更没有预定的路线图，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语）的。我们在探索、试验、创新中不断摸到过河的石头，逐渐地形成了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她是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官方与民间、企业与事业、集体与个体等共同探索、互动发展中通过一块一块“石头”的不断积累、铺垫和完形的结果。

如何总结和概括 30 多年走过的路？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在做

着理性或激情、乐观或悲观的思考。思考的一种结果是将改革探索沉淀的成果叫作“中国模式”。

这种思考方式的始作俑者是西方人。2004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先生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雷默明确地宣称要总结一套关于中国发展和实力的新物理学,以“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此后,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被贴上了“中国模式”的标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与评论。

诚然,高等教育与其他事业一样,30多年一路高歌猛进,发展速度之快当举世无双。回首来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举凡办学和管理权力的下放,地方大学的横空出世,民办大学的异军突起,高等学校的“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划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水平大学建设制度如“211工程”和“985工程”,都是在摸索中前行。摸到石头,总结经验,快速推广;没摸到石头,或修正路径,或另辟蹊径。对此,肯定者对此褒奖有加,批评者也对此诟病颇多,如何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这恰恰是进一步讨论的价值所在。争论的缘由之一是在我们在理论和政策上准备不足,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进程,或者说,实践逻辑走在理论逻辑的前面。这大概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文章不断见诸报刊,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大学模式的研究日趋升温,既有外国学者的热切关注,更有国内学人的积极探讨,赞成者与异议者各持一端,形成多年未见的、颇有意蕴的学术争鸣局面。总体上看,这是理论界希冀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依赖,为今后发展诉诸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努力。因为世事日趋复杂,我们并不总是能摸到石头。

于是,系统梳理、回顾、总结最近3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成为一项颇具价值的基础性工作,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本书旨在进一步认识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进而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概括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殊性以及累积的“地方性知识”,探究高等教育发展可能存在的“中国模式”。

在此,特就本书作出几点说明。

1. 时空边界

界定和限制一项研究的时空是必要的。本书时间是指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也有自己的模式, 但不在本书叙述的范围; 空间是指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改革实践与探索, 也许香港、台湾地区、澳门更有特色, 但不是本书讨论的对象。

2. 研究思路

本书定位为一部从宏观层面描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著作, 重心在于凸显中国社会独特转型、经济快速增长、文化冲突加剧的背景中, 高等教育究竟发生哪些变迁、处于什么状态、形成何种模式、背后深层缘由以及未来发展路向。

3. 基本立论

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是长期发展累积的结果, 是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因而对其研究尽力秉持客观立场, 遵从“去时间性”和“去价值性”的阐述方式。所谓“去时间性”, 就是论述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时, 尽量回避“早发内生现代化”与“后发外生现代化”、发达与发展中、先行与赶超等的时间维度的历时叙述; “去价值性”是指在阐释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时, 作者尽量不作价值判断, 只描述“是什么”, 即对其进行客观描述, 并作相应的追问“为什么”, 但尽可能不进行价值判断, 不采用西方与东方、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的价值比较。

4. 主要问题

试图回应近些年人们普遍关注的有关问题: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何为“中国模式”? 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意义与影响因素有哪些? 普通本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新办本科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是否创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是否初步形成了可以称为“中国模式”的东西?

5. 核心观点

以“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为关键词, 从理论上归纳和描述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认为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初步形成, 表现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高等教育地方化模式、本科教育发展模式、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终身教育发展模式等。

必须指出的是, 研究中国模式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与问题, 进一步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 以便更好地面向未

来。未来与其说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如说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未来的创造，不应该也不再可能依靠“摸着石头过河”了，需要的是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科学理性，需要对未来的准确预判，需要对发展的合理规划。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的大多时候，我们“摸着石头”过了河，确实足够幸运，但不可能总是“摸到石头”，蹚过未来之河，实现民族梦想。走向未来，必须有赖于科学精神的普及、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而教育正是构建未来社会的基石。唯此，中国模式才可持续，乃至可以被他人学习、借鉴和复制。

刘 晖 识于观云斋

2013 年 8 月 19 日

目 录

我们总能摸到石头吗? (代序)	(1)
第一章 呼之欲出的“中国模式”	(1)
第一节 “中国模式”之缘起	(1)
第二节 “中国模式”之争论	(6)
第三节 “中国模式”之特征	(12)
第二章 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20)
第一节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21)
第二节 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特征	(30)
第三节 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之文化分析	(43)
第三章 高等教育管理的中国模式	(63)
第一节 中央集权主义的管制模式	(63)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管理模式	(70)
第三节 走向多中心的治理模式	(79)
第四章 高等教育地方化的中国模式	(90)
第一节 高等教育地方化进程	(91)
第二节 中美英三国高等教育地方化政策比较	(97)
第三节 广东与台湾高等教育地方化政策比较	(105)
第四节 高等教育地方化中国模式的意涵	(124)
第五章 普通本科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130)
第一节 普通本科教育发展进程	(130)
第二节 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模式	(143)
第三节 民办本科高校发展模式	(150)
第四节 独立学院发展模式	(156)
第六章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163)
第一节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进程	(163)

第二节 高等职业教育运行与管理模式	(173)
第三节 由“层次”走向“类型”的发展模式	(191)
第七章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中国模式	(199)
第一节 终身教育发展进程	(199)
第二节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现况分析	(205)
第三节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	(218)
后记	(240)

第一章 呼之欲出的“中国模式”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托克维尔

自有人类历史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启蒙思想家们就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如社会正义、权力起源、民主政体、平等自由、人权保障等，进行了原创性的思考与陈述，形成基本共识；但迄今为止，人们未曾认可过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难以预制，也不可照搬他国经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持续探索，增添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样式与发展可能，扩充了人类对未来的想象空间，“中国模式”就是正在行进中的、增加新的可能性的、丰富着人类想象的创造！

——作者题记

第一节 “中国模式”之缘起

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取得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被视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的奇迹。^① 社会的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教育结构亦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变迁：逐步走出传统农业社会，以各种方式走向城镇，2011年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人口迁徙规模庞大，超过2亿的农村人口进入

^①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近10%的增长率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增长的速度不仅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时期的增长水平，对于一个在人口、疆域、经济规模、文化历史、政治影响等方面都堪称“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城市打工，农村留守儿童和随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面对巨大挑战；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与分配不公使得社会公平与公正受到空前挑战，中国的基尼系数、物价上涨指数、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居高不下或不断攀升，贫富差距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扫盲教育与义务教育齐头并进，使得中国受教育人口数量达到历史未有高度，高等教育曾经以平均每3天新建一所大学的速度增长，^①不断被提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城，使中国从高等教育“小国”迅速成为“大国”。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估算：如果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翻了1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这样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堪称实至名归。这个奇迹的出现，既非遵循本书叙述的“先进理论”，亦非模仿前人提供的“成功经验”，而是依靠在各种争论和批评声中的执着探索与制度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这种有别于他者的国情特征、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引发国内外政界、学界、民间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管理者、改革者和研究者，或对其进行概括总结，或对其予以借鉴推广，或对其进行学理探究，或对其发挥自由想象。

回溯历史，我们竟然发现首先使用“模式”一词来区分中国与他国之不同或彰显中国发展之特色的是邓小平。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中国模式”问题。1980年5月，他在涉及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对比时明确提出“中国模式”问题，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②1987年10月，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谈了三条意见，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作出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1988年5月，他强调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用固定的公式去硬

^① 钟丽玲、邝凝丹：《纪宝成做客广商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每三天诞生一所大学，发展太快”》，《信息时报》2011年12月24日第A3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套,“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只用一个模式去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①。显然,邓小平是以政治家的胸襟,站在历史、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来议论模式问题的。

事实上,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探讨从改革一开始就展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经济改革模式的研究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焦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的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双模式转换”的模式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厉以宁等提出的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派”的观点;华生等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论;董辅初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的观点;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的“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等。这些成果对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②真正广泛探讨中国模式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情。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等领域,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在持续升温。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于北京大学召开名为“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在会上从多学科视角多中国模式进行研讨,呈现许多有重要影响的观点。近年来,围绕“中国特色”、“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报刊文章可谓“连篇累牍”,研究的视域不断拓宽,成果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不断加强。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30多年前,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一旦中国找到了其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是无价的。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境)外华裔学者参与到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提出不少“旁观者清”的看法,引起高度关注。相关言论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著有《辩论“中国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郑永年(著有《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著有《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为代表,他们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对中国模式的思考。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② 张宇:《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期。

事实上,今天世人津津乐道的、政界学界议论纷纷的所谓“中国模式”一说乃是个“舶来品”——滥觞于西方话语系统。西方首先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概念的是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在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问题时说:“我认为中国会有较好的条件,至少国家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还存在公有制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造就的。所以,我想很显然,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接受进步的思想。但是,我想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中国的发展进步。比如,美国就不希望你们成功,不希望你们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人不想要什么新模式。他们宁可要金钱、消费等等。所以,我想不管怎样,一定形式的斗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揭露这些势力。”^①系统阐述“中国模式”的则是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雷默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他在2004年5月7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并于几天之后的5月11日在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研究报告,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雷默明确地宣称要总结一套关于中国发展和实力的新物理学,以“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在雷默之后,“中国模式”的提法开始流行于国际学术界。最近十余年,中国特色的发展被贴上了“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标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与评论,一时间,大批传媒和研究者基于复杂的背景、缘由和立场致力于描述和解释中国模式。^②《北京共识》出

① [美] 詹姆逊:《詹姆逊文集(1)》,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② 参见黄守红、傅菊辉、易大东《“中国模式”问题研究述评》,《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1日第7版;谢立中《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郝卫东《美国学者认为俄罗斯不能照搬“中国模式”》,《国外理论动态》1994年第25期;卢获《浅说“中国模式”》,《读书》2000年第6期;[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年第4期;蔡拓《探索中的“中国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田春生《理解“中国模式”的制度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范强威《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价值核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等。

台的背景是针对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写的《华盛顿共识》^①的价值导向，中国（无论政府、学界还是民间）一开始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争论。当然，后来的情形有所不同，国内有识之士基于各种需要主动阐释中国模式。当然，对中国发展独特性的关注并非始于《北京共识》，汤因比在中国改革伊始就发出预言：“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②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围绕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和“中国模式”的论坛破土而出。2006年，美国古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并在清华大学开设“清华—布鲁金斯中心”；2007年，英国三所著名大学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在多家英国官方基金会的资助下，联合建立了“英国校际中国中心”；201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国际东西方研究中心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中国模式研究院”，着力于站在国际视野和国内实践的角度上对中国模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2010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还接受了美国众议院的一项名为“中国模式”的课题。各色论坛也十分活跃，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自2006年以来，以“重新定义中国政策”为题，先后进行了9次辩论，议题涉及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贸易政策、中国的金融体制，以及中国在亚洲的角色及其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创建于2007年“温室论坛”（Glasshouse Forum），近几年的圆桌会议都有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2010年8月4—13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举办了一场以“有没有中国模式”为题的网络辩论会；等等。

① 约翰·威廉姆森，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华盛顿共识”核心是实现经济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但实施“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深受其害。严格来说，“华盛顿共识”并不等同于总体概念上的“西方模式”，它是源于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思想的主流西方资本主义模式。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从西方人的视角研究中国模式，无外乎三种心态：一是希望从中国成功中获得启示，希望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发展模式，总结经验，提出对策，这是从现实政策和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应用研究；二是希望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研究中，寻找有别于传统现代化理论或阐释转型社会的新理论，这是出于学理的追索；三是对中国的发展不甚了解，内心迷惑，心怀忧虑，或是对中国发展怀有偏见，视其为西方发展模式最危险的挑战者，希望破解谜团以缓解内心的紧张与焦虑。

从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模式，也无外乎三种心态：一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希望总结中国模式以振我国威，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二是基于学术研究立场，试图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的理论逻辑和历史缘由，从学理上研究和阐释中国发展累积的经验；三是出于改革实践理性的需求，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角度进行政策研究，廓清历史与现实，以便更好地面向未来。

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滥觞于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的曲折实践与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理性和内生性制度创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与转型，逐步形成了一个西方人看中国人和中国人看自己的“概念式”分析框架，使用“中国模式”似乎可以更加准确同时又宽泛地表达对中国发展的可以理解和难以理解的变革！事实上，中国模式业已是当代东西方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视角和路径。不管动机如何，无论角度差异，抑或结论相左，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普遍关注、议论与研究已成不争的事实。

第二节 “中国模式”之争论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中国所独有的还是可以复制和推广的？对于这些问题，政论家、民间和学术界回答不尽相同，海内外学术界也说法各异。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看法：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

首先，对于“中国模式”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假命题，存在争议。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人们从一开始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问题就持不同看法。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对于中国模式一说

保持警惕和担心，因为“中国模式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否认它的存在，是为了抵制主流话语把中国模式当做宣传中国特色的宣传工具”。^①举例来说，总结“中国模式”的张维为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引起学界的侧目，对其基于“民族自豪感”的意识形态式宣传深感不安甚至不屑，有学者表示：对此书“从头至尾毫无逻辑而振振有词”感到相当“震撼”。^②另一些持反对声音的来自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模式一说的代表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③他进而指出：“在成功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办法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④类似的言论在一些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那里亦有较大的共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专家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在《中国现代化——世界的威胁还是别国的榜样？》（2008）一书中，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框架里考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将中国的现代化绩效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矛盾影响了改革的进展，但同时也给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中国还不是一个成功的榜样，当然也更不可能对西方模式构成威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进和国力增强，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人大体上持三种观点，即“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模式论”，前两者居主导声音，后者引发越来越多的注目。对此，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

① 肖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② 俞斌：《毫无逻辑的〈中国震撼〉》，《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20日第A—02版。

③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自序。

④ 同上书，第10页。

治制度。这些声音在大谈中国模式如何有意义有价值的背景中，多少有些促人反思、发人深省的味道。

一批国内外的主流学者们仍对“中国模式”津津乐道，将其看作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及其原因的描述与总结，认为：“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具有世界意义，尤其面临《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遭遇挫折的背景下。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旗帜鲜明地力主“中国模式”，他认为：“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笔者并不赞同这一提法，而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①参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的人文社科学学者们大多持此观点，正如主持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所言“是时候开始总结中国模式了”。^②中央党校的赵宏明确提出：“有四大模式主导了二战以来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即新自由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③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倡导中国模式研究的学者，他认为：“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④更多的学者是从自己的学科专业角度理解或阐述中国模式的。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并未就“中国模式”作出正式回应，或者说刻意回避使用此概念，更愿意使用“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词汇替代对类似问题和语意的表达。为数不多的评述和专论来自半官方人士，如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陈锦华在《人民日报》

① 俞可平：《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红旗文稿》2005 年第 19 期。

② 潘维、玛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21 页。

③ 赵宏：《中国模式与世界主要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09 年第 12 期。

④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前言。